

我学生时代的三个“怪”老师

回想起来，20世纪80年代我念小学那会儿，没有新东方和奥数班，直到三年级，我才参加了平生第一个兴趣班。起因也有点奇怪：我塞进课桌里的一个笔记本上记着几句我随口诌的词儿，被好事的同桌拿去向大队辅导员献宝，后者那时大概正在给区少年宫招募学员……总而言之，很快我就收到了“儿童诗歌班”的邀请信。后来才知道，发信的老师姓诸葛，是个快退休的老头儿。

虽然早就有思想准备，知道这位诸葛先生不会有羽毛扇，但初见之下，还是大失所望——干瘦的身板，半秃的脑门，加上脱落了大半的牙齿，看上去早就过了60岁。他不知道怎么爱笑，既不擅长侃侃而谈，又不见得能循循善诱。比起隔壁的“儿童电脑班”（彼时正值“电脑要从娃娃抓起”刚刚发表），这里非但人气衰微（不超过15人），而且哪怕在人数达到峰值时，也没有谁在认真听讲。

奇怪的是，诸葛先生对这些好像一点儿都不在乎，最多偶尔停下来，叹一口气。他上课的方法简单得全无技巧可言，常常是刚才还在讲“却话巴山夜雨时”，突然一个急转，就拐到了“假如生活欺骗了你”。他会一首一首地写在黑板上，一笔一画都像是拼尽了全力。他很少作什么口头评点，却很喜欢在诗句的字里行间作一些符号，那些地方多半就是他最在意的句子了。

先生让我们跟着抄，连那些符号也不可以落下。可他总是等不到我们全抄完，就急忙吩咐大家扯开嗓门朗读，声音越大越好——下课铃多半总是在这种节骨眼上响起来，我们戛然而止，诸葛先生也会一下子愣住，一脸的困惑，“还有很多没讲呢……”照例挥一挥手，叹一口气。

初三那年，学校调来的一位语文老师，和诸葛先生一

样，也是个快退休的老头，也有个很不常见的姓氏——我们叫他宓老师。

平心而论，宓老师的课比诸葛先生上得更专业，也晓得隔两天就念一回中考的紧箍咒，抱一擦卷子督促大伙儿背标准答案。不过班上有几个同学——包括我——的语文成绩在他看来足够好，于是常常会得到减免作业的待遇，这在毕业班里可不是寻常事。有时候碰上他特别讨厌的课文，他就跟我说：“这课一点儿意思都没有，你不用浪费时间。带小说了吗？拿出来看！”

我一直记得那几本书的名字，《围城》《写在人生边上》《干校六记》《洗澡》。“别的书可以不看，”宓老师眯起眼睛愉快地分享他的秘密，“这两位，一定得读”。

当我拿到直升本校高中部的名额时，宓老师就把我叫到办公室，视线聚焦于别处，像是对我说，也像是对自己说：“你将来可别选中文系啊。”“啊？我可没想过这问题。”“进高中就得想啦。听我一句话，学英文，学点有用的。”“有用的”3个字被他加重了语气，可他随即又摸出一张书单，上面照例写满了“无用”的作品。

从“无用”一步三回头地走向“有用”，差不多构成了我高中和大学前半段的主旋律。我被那时上海人眼里最“有用”的上海外国语大学（以下简称“上外”）录取，念时髦的“复合型专业”。

上外真是个“有用”的地方。上世纪90年代中期，一门外语不仅是一门外语，它还通往薪酬惊人的“五大”（会计事务所），通往太平洋对岸那一溜“常春藤”名校。在这样的环境里，我们的英语教材充满了情境对话和应用文写作，我们的老师总是匆匆地来匆匆地走——有的是各种各样的语言培

训班在等着他们，例外的没有几位，江老师算一个。

那只是一门学分不高的选修课——英美散文选读。按上外人的习惯思维，这显然得归到为数不多的“无用”课程里去。第一堂课，先有人搬来椅子，再是茶缸，最后才是年逾七旬的老教授本人，一步一挪地进来。“我是江希和。”老头儿坐下来，话音里有点喘。

至今都记得他，不单是因为那一口老式伦敦腔，不单是因为我们很快在《英汉大词典》的编委名单里找到了他的名字，不单是因为当时传过他好几个版本的坎珂身世，也不单是因为他从来不用现成的教材，只发一本油印的讲义，课间休息时最大的乐趣，就是检查我们有没有在那份讲义上添上足够详细的听课笔记。让我最难忘的，是他从来不把文章切成一个个“有用”的词语碎片，不会津津乐道于某个词的社交功能，他强调的，是我在上外很少听到的那个字：美。

在他的眼里，扬眉吐气的塞缪尔·约翰逊回击切斯特菲尔勋爵的信——那种酸，那种迂，那种春风沉醉——是美；《廊桥遗梦》最后，男人写给女人的信——那份苦，那份甜，那份今生无悔——也是美。讲义内，19世纪的伊利亚与精神病严重的姐姐相依为命，被迫终身不娶，姐姐病发时他们俩只能手拉手一起哭；讲义外，江老师的情绪也跟着忽上忽下，有好几次都几乎挣扎着要从高脚椅上站起来。

整个大学里，唯有在他的课上，我才找到了一点久违的“无用”的乐趣。而这点乐趣诱引着我找回最初的自己——10多年后，坐在出版社里，翻开自己编辑的《伊利亚随笔选》时，我仍然庆幸当年的决定。

（摘自《假作真时》译林出版社黄昱宁／著）

高校加强师德制度建设

2018年4月8日上午，北京大学教师职业道德和纪律委员会召开了一次专项会议，议程之一是讨论《北京大学反性骚扰有关规定(建议稿)》（以下简称“建议稿”）。

2014年10月9日，教育部发布的《关于建立健全高校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意见》(以下简称《意见》)明确：建立健全高校教师违反师德行为的惩处机制，并划出师德禁行行为“红七条”，其中就包括对学生实施性骚扰。

近年来的一些个案表明，国内高校已着手建立完善师德制度，但离形成长效机制的目标还有差距。

反性骚扰的“一个起步”

据北大官网透露，此次专项会议，对建议稿的适用范围、学校反性骚扰的机构设置、对性骚扰行为的投诉、调查、认定、处理程序以及反性骚扰的教育与预防工作进行了研讨。

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沈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，国内高校在反性骚扰建立机制方面相对欠缺，北大正在考虑常规机制的建立，“是一个起步”。

在违反师德的行为中，性骚扰因对学生身心侵害性较深，往往更为社会关注。2018年1月，教育部两次回应北航教师陈小武性骚扰学生事件，明确表明其“零容忍”态度，要求“发现一起，查处一起，绝不姑息”。

2018年妇女节，一份北大学生自发调研形成的《北京大学学生遭遇性骚扰状况调查报告》（以下简称《报告》）在北大学子的朋友圈中流传。

《报告》显示，190名受访者中，有三成以上声称遭受过各种形式性骚扰，其中超六成遭遇过两种形式及以上的性骚扰。曾遭性骚扰的68人的相关经历，15%源自学校中的教师。

“有一个完整的监管方案、解决机制，会让我们更有安全感。”北大女生杨阳对记者说。

“红七条”与模糊地带

《意见》并未就“师德”的定义及范畴作出明确说明。而同时发布的“红七条”，以反向方式界定了师德的底线。

但即使是明确列举的这七条，也存在模糊之处。比如，与“对学生实施性骚扰”一起列在第七条的还有，“与学生发生不正当关系”。但何为“性骚扰”，尤其是哪些属于“不正当关系”，都不明确。

这些概念的理解，与文化背景和国民认知相关。2007年，武汉科技大学城市学院曾要求辅导员签承诺书，其中，“不得以任何理由与学生谈恋爱或超出正常的师生关系”引发巨大争议。而美国许多高校不提倡甚至明文禁止师生恋。著名学府哈佛早在1984年就颁布文件，禁止教授（包括教授的学生助理）和其直接授课或指导的学生之间“有浪漫关系”。

2001年，美国威廉玛丽学院一位教师披露了自己与一个已婚学生的恋情故事。受此事影响，加州九所大学联合修订教师守则，出台了更加严苛的禁令。

“不正当关系”通常指向婚恋、性行为等关系，但或不仅限于此。比如，某高校在通报某教师的问题时，指其存在与学生认义父子等与教学科研无关的行为。

较常见的还有“导师老板制”。一些研究生称导师为“老板”，而自称“科研民工”。在学术科研、毕业、留学、就业等各个方面，导师既可能提供帮助，但也可能制造一些障碍。在一定程度上，导师掌握了某些“权力”。

作为一名博导，沈岍也坦承，“因为其中存在特殊的权力关系，导师在机会和评价两大方面影响学生。”

现有的一些改革举措，也使得师生科研关系趋于复杂。广西大学研究员龙耀说，在理工科推行的导师责任制和导师项目资助制，研究生导师不仅是学生论文的指导老师，同时也成为了科研经费和生活费的直接来源，学生的劳动报酬、生活费和奖学金全部仰仗导师。“又多了一层经济关联，加重权力不平衡。”

同样模糊的还有导师的“家务事”。龙耀认为，任何超出学业范畴的杂事，导师都没有理由占用学生的私人时间。

师德谁来管，怎么管

据北大新闻中心网站介绍，北京大学教师职业道德和纪

律委员会负责对教师在学术道德和职业操守等方面的评价，受理针对师德师风方面的举报投诉，并根据情况开展立案调查和提出处理建议等。

该委员会成员中，1/3为学校行政方面的负责人，2/3为本校教授；主任由主管人事工作的校领导兼任。委员会主要通过专项调查和会议形式开展工作。自2015年11月以来，该委员会已召开过5次会议，对存在师德失范以及其他违纪行为的教师进行处理。

为保障教师权益，有的高校还会由教师发展委员会推荐数名教师代表成为成员，浙江大学师德建设工作委员会正是其中一例。

“基本靠人治。”谈及浙大师德建设工作委员会日常如何运转，一位委员会的教师代表对记者说。

“往往一件恶劣事件要持续发酵、暴露得非常严重的时候，才会上升到师德评价委员会的程序里。”龙耀说。

北大此次专项会议重申的师德“一票否决制”，也是教育部的统一要求。《意见》提出，各地各校要将师德纳入教师考核评价体系，并作为教师绩效评价、聘任（聘用）和评优奖励的首要标准，严格执行“一票否决制”。对师德表现失范的，要依法依规严肃处理。

在近年来几个师德失范事件中，各高校的处理力度不一：或直接开除相关教师，或要求其本人辞职，或作出警告、记过等处分，或让相关教师转至非教学岗位。加上相关调查程序很少公布，一些事件的处理结果引发了公众的疑问。

在沈岍看来，目前中国导师使用权力是否合理，很大程度上依靠导师个人的自觉。他建议，把导师和学生的关系更多转向制度层面、规则层面。

“应该依照规则执行，尽可能明确导师正当合理的权力及其边界，也要明确学生的权利和义务。”沈岍说。（文中学生均为化名）

（摘自《南方周末》贺佳雯/文）